

“世俗之神”的智性审视

——鲁迅小说中金钱话语的意蕴分析

周丽娜

(烟台大学 中文系, 山东烟台, 264005)

摘要: 以金钱为核心话语的经济活动及其意义是《呐喊》和《彷徨》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鲁迅的小说文本最早建构了具有多重现代性内涵的金钱话语, 并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 表现出强大的人文力量和实践力量。鲁迅既对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倾向心存忧虑和愤慨, 同时又认为金钱在现代社会是个体生存和自由的保障。对现代社会中经济结构向人类精神结构渗透和影响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思考, 是鲁迅智性思维方式的深度所在。

关键词: 鲁迅; 金钱话语; 人性; 个体生存; 女性; 智性审视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4-0569-05

鲁迅一直被看作思想启蒙大师, 似乎人的精神存在是鲁迅唯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而事实上, 鲁迅从未放弃和忽视对人的物质生存问题的思考, 其小说文本中频繁出现的金钱话语即是证明。在《呐喊》和《彷徨》的25篇小说中, 有15篇出现了金钱, 比例为60%, 甚至有些文本中金钱的出场次数超过了主要人物。可见, 金钱是鲁迅思考人性与人类命运的一个重要事物和角度。金钱话语是人的物质性存在的一种隐喻, 鲁迅对“金钱”这一现代社会“世俗之神”的智性审视开启了对人的物质性存在的现代反思。

鲁迅首先从伦理、道德和革命等角度对金钱异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货币本是商品交易的中介, 在货币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渗透到人类的社会关系中, 逐渐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道德和伦理关系, 变成新的关系纽带。货币经济一方面引导和促成了人类理智力的成熟和发展, 另一方面却遮蔽、扭曲、取消了人类之间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感, 即“最表面的、无质的东西同生活的内在实体之间的对立, 在这里达到了巅峰”。^[1]金钱与人类情感的对立, 在现代社会更为显著。

《弟兄》中秦益堂的儿子们为钱不停地吵架, 而张沛君弟兄看来则相处和睦、兄弟怡怡。弟弟张靖甫生病后, 哥哥张沛君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担忧和关心,

但张沛君的梦境却暴露了他真正关心的也是金钱问题, 而非弟弟的病情。“和”与“不和”只是表面现象, 内在的金钱追求才是两种兄弟关系的共同本质。对秦益堂的儿子们来说, 金钱破坏了手足之情; 对张沛君弟兄来说, 金钱取代了手足之情, 成为弟兄关系新的纽带。正是从金钱出发, 鲁迅戳穿了各种伦理关系的虚伪性。

金钱具有将一切事物直接量化和客观化的特性。现代社会中, 人们倾向于将金钱作为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 金钱成为人类世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上帝”。《一件小事》由道德角度质疑和反思了金钱的力量。开始时, “我”与车夫是一种契约性的交易关系。如果以金钱来衡量, 只有车夫准时顺利地把“我”拉到目的地, “我”付出的钱才产生了价值, 车夫的劳动也因交换来了等价的金钱而获得了价值, 这样对双方来说才是公平合理的。后来, 车夫因为关心摔倒的老女人而耽搁了“我”的行程, 破坏了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结果损害了双方的利益。“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憎恶和生气。道德关系本来并不存在, 而是经由“我”的深刻省思和忏悔后产生的。“我”虽然是这笔交易中的买方, 但“我”同时也是具有强烈道德感和省思精神的知识分子, 车夫的态度和行为使“我”顿悟自己的“小”, 即具有缺乏同情心的道德缺陷。这样, 在道德法官面前, “我”与车夫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在金钱、地位、知识和智慧等方面均怀有优越感的“我”进行道德省思后发出了真诚的忏悔。交易问

题便转化为一个道德问题,“我”不假思索地抓出一大把铜元,请巡警转交车夫。这一大把超过了应付车资的铜元表达了“我”的真诚忏悔和对车夫的由衷敬佩,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友爱。但是这“一大把”钱能否负载这么多的人类情感呢?“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2]鲁迅对以作为物的尺度的金钱来衡量人类美德提出了质疑,对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思考。

《药》进一步在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与群众的金钱逻辑中发现了为金钱所异化的人性悲剧。革命者夏瑜实际上置身于一个遵循金钱逻辑的社会空间,他仅被周围的群众视为榨取各种利益的对象,而非一个值得同情怜悯的人,更不是一个拯救者。从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到华老栓与夏瑜的联系都在金钱逻辑的范围内。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得知夏瑜穷得榨不出一滴水后,生气地狠揍了夏瑜一顿,并拿走了他的衣服。刽子手康大叔靠卖夏瑜的血赚了一包洋钱,但他仍然为没有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愤愤不平:“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3]遵照金钱逻辑,从夏瑜的牺牲中获利最大的是出卖他的亲戚夏三爷,其次是刽子手康大叔和管牢的阿义,最后是华老栓。当然,华老栓与前三人不同,他的获利不是因为对夏瑜有意识的迫害,也不是因为他以赚钱为最终目的,而是因为他的麻木和愚昧。华老栓的金钱是用来交换人血馒头,而人血馒头是用来交换儿子小栓的生命,在这样的交换逻辑中,人血馒头也像金钱一样成为一种客观的手段。鲁迅以“掏了半天”“抖抖的”“按了两下”等一连串的动作生动细致地表现了华老栓对金钱的珍爱态度,因为这一包洋钱在华老栓心里等于儿子的生命。华老栓用金钱从刽子手那里买到“人血馒头”,不必直接面对夏瑜的死亡,但是见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还是感受到了恐惧,他“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刽子手,却又不肯去接那个人血馒头。刽子手则扯下灯笼上的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然后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在这笔交易中,刽子手以其残忍和冷酷用别人的生命赚到了一包带血的钱,华老栓以其愚昧麻木用金钱买来了暂时的希望。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从革命者的牺牲中获利最大的是以残忍的夏三爷为代表的告密者,其次是以冷酷的刽子手和管牢的阿义为代表的统治制

度的执行者,最后是以愚昧的华老栓为代表的普通群众。在金钱逻辑中,人们不仅认可了愚昧,而且羡慕和推崇残忍和冷酷。鲁迅以金钱集结了神圣、崇高、愚昧、麻木、冷酷和残忍等各种人性内容,如西美尔所言:“货币在交换中,它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互相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4]在这种拼贴和并置对比中,鲁迅显示了他对革命的独特理解思考:在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的社会中,革命的神圣和崇高终将被愚昧麻木和残忍冷酷所消解。

由这三篇小说,我们发现鲁迅首先是对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影响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和批判意识,对金钱带来的人性异化充满深切忧虑和无限愤慨。但他并非简单地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罪财意识,不是单纯以道德立场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而是在肯定人的物质生存意义的基础上显示了一种智性思考。

二

在金钱与个体生存的关系中,鲁迅肯定了金钱对于个体生存的积极意义,表达了他对金钱内涵的现代意义的理解和阐释。

《端午节》思考了金钱对于现代人职业化生存方式的深刻影响和意义。在一个对金钱的合理欲望得不到公开承认和保护的社会中,职业化生存方式总是面临着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威胁。一方面,政府以“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为借口剥夺了以方玄绰为代表的教员们的生存权;另一方面,自私、怯懦和保守的方玄绰自身也陷入了这种金钱话语的牢笼,不能以正当的金钱话语来维护自身合理的生存权。金钱的主观意义与客观功能的严重对立使方玄绰陷入了生存困境。方玄绰要保持人格的清高,就得与金钱划清界限,但他也承认生存离不开钱,也有正常的金钱欲望,所以,在教员付出了头破血出的代价讨来薪水后,他也照领不误。他将太太挣钱的想法斥为俗气,而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不能免俗。挣扎于生存欲望与金钱罪恶观念之间的方玄绰既没有得到维持生存必需的金钱,也不能将自己的假清高坚持到底。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是源于鲁迅对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作家的职业化生存方式的思考。鲁迅认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5]对于职业化生存的个

体来说，金钱首先意味着生存的保障和权利，薪金是个体付出劳动后应得的劳动报酬，从物质生存的角度来说，作为薪金的金钱是个体应得的权利。但因为金钱以其核心价值充当一种完全百依百顺的工具为最卑鄙的阴谋诡计服务，人类就赋予了金钱卑鄙庸俗的负面涵义，尽管高尚的行动和卑鄙的行动得到的是同样的服务。鲁迅显然是将个体的生存权与这种金钱观念进行了区别和分离，从而赋予了金钱更为理性的现代内涵。

金钱对知识分子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生存的层面，这种对生存的影响也直接决定了知识分子人生理想的实现。知识分子清醒理性的金钱观念与周围的群众形成了严重对立，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孤独处境和失败命运。魏连受、吕纬甫与方玄绰不同，他们都摆脱了传统金钱观的束缚，既不忽视金钱的客观价值和功能，也不把金钱作为自己生存的终极目标。他们的这种观念却与其生存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最终导致人生理想的落空或失败。《孤独者》中的魏连受渴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联系，视情感的价值高于金钱，他像《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一样将自己的钱财慷慨地施与那些需要或不需要帮助的人。魏连受周围绝大多数人最看重的却是金钱，一旦魏连受穷困潦倒，曾接受他帮助的人，包括那些他曾经真诚关心过的房东的孩子们都躲着他。而魏连受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后，每月薪水丰厚，那些曾鄙弃他的人又都来巴结他，希图从他那里获取好处。即使他以侮辱的方式施舍钱物给房东的孩子，房东老太太也不以为辱反以为荣。此时魏连受谋取钱财不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想以此报复冷酷的社会。魏连受的生存困境表达的更多的是鲁迅对金钱多重现代性内涵的一种心理体验，因为我们不能排除金钱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可以通过有效地利用来为高尚的事业服务，而鲁迅在现实生活中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这样做会面临重重困难。

《孔乙己》则从反面证明了金钱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在这篇小说中，金钱全方位地决定着孔乙己的生存位置和生存形式，决定着他与周围人的关系，金钱的出场次数甚至超过了孔乙己。作为消费场所的咸亨酒店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来此消费的人依其一次性消费的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

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6](434)}那么，孔乙己在这些人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孔乙己一来，人们便取笑他，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6](435)}尽管孔乙己与那些短衣帮一样，也是站着喝酒，但他还是竭力表现得与他们有差别，这差别不仅仅表现在穿着长衫，更重要的是他比那些短衣帮显得更有经济实力——他可以骄傲地“排”出九文大钱，而短衣帮则只花了四文钱。鲁迅以“排”的动作表现了孔乙己面对没文化的短衣帮时心理上的骄傲。事实上，他在物质生活方面还不如短衣帮。短衣帮尚能靠自己的力量谋生，而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孔乙己则连正当的职业也没有，连谋生方式也有些不光明。短衣帮只把孔乙己看作取笑的对象，由此看来，孔乙己实际的社会地位也不如短衣帮。当然，孔乙己也没将短衣帮看在眼里，他的人生理想是丁举人之类的长衫客。在咸亨酒店里，长衫客的消费能力远远超出了孔乙己，他们是“踱”进酒店，而且是“坐”着喝酒。孔乙己尽管也穿了长衫，但穷困使他根本没有这种资格，所以金钱又将穿长衫的孔乙己与其他长衫客区别开来。从消费的角度看，孔乙己已是咸亨酒店这个生存空间中的一个异类，他“在”而不“属于”任何一类人。金钱同时也决定了孔乙己与周围人的关系。丁举人们廉价利用孔乙己的知识，在他偷窃后又将其毒打致残。被打断双腿的孔乙己没有得到任何人道意义的关心，而是继续受到取笑，人们只是把他的悲惨遭遇作为有趣的事件来消费。孔乙己死后，惟有酒店掌柜出于对孔乙己欠的那十九个钱的关心而不断提到他，而孔乙己作为一个生命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消失。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金钱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影响、制约着孔乙己所在世界人们的精神、身体活动甚至整个生活方式。同时，科举制度、长衫人物、短衣帮、酒店掌柜和小伙计等从不同角度形成无所不在的否定力量，不断粉碎孔乙己残存的生存梦想，使孔乙己生存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麻木、冷漠、无望的世界。”^[7]以金钱为核心形成的否定力量形成了一个冷酷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孔乙己丧失了其生存的价值和可能。

由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也很关注物质生存层面的问题，肯定了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正面价值和意义。他认为金钱是个体生存的保障，是个体实现理想的物质基础，更是个体，尤其是女性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任何脱离经济基础的理想都只能是空想，任何脱离经济基础的行为和追求

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三

鲁迅对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也与金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8]

《祝福》中的祥林嫂与金钱发生的三次关系说明了其依附性生存处境的彻底性。第一次祥林嫂辛苦得来的工钱最终都交给了她的婆婆，她有赚钱的能力，却没有拥有金钱的权利，甚至没有自由劳动的权利。第二次是祥林嫂的婆婆以八十千的价格卖掉了祥林嫂，在这种金钱与人的交换中，祥林嫂也被贬低为“物”。第三次是祥林嫂因接受了柳妈的迷信思想希望用金钱来赎罪，最终却没有得到主人的认可，这里的金钱则显示了她在精神上的依附性处境，精神上的依附又反过来使祥林嫂不可能有效地利用金钱来实现自由和独立。祥林嫂的全部悲剧性正在于这种从身体到精神的依附处境的彻底性，这使她陷入了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解脱。《离婚》中的爱姑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曾提出强烈的抗议，似乎比祥林嫂更有反抗性，但在金钱的制约下，爱姑的反抗因依附于其父而显示出其有限性和虚弱性。在爱姑的离婚事件中，父亲庄木三的态度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爱姑的勇气和信心。当七大人出面调解时，爱姑的离婚事件在金钱的作用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庄木三表现出来的沉默一方面是因对权威的畏惧，另一方面也是因对金钱的贪恋。爱姑也察觉到了父亲的这种心理，她曾不满地说“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当金钱介入时，原来的是非问题转化为爱姑的委屈值多少钱的问题。在七大人面前，爱姑的夫家又被要求加了十块钱，并且慰老爷劝说道，“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这话只有我们七大人肯说。”^[9]这时候，除了爱姑自己，包括庄木三在内的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这些钱足以弥补当事人的损失。金钱将爱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客观化、数量化了，变成了一个除当事人自己，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所谓“合理”结果。可以说，最终是金

钱结束了这场离婚纠纷。正如西美尔对货币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后的发现：“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按照金钱对价值斤斤计较教我们学会了把价值确定和具体到最后一厘，并且在对比各种各样的生活内容时给它们强加上越来越大的精确度和明确的界限。”^{[2](359)}所以，“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趋势——把质化约为量——在货币中达到其最高和最独一无二完美的呈现。”^{[2](208)}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在货币还没有达到一定数量时，庄木三更关心女儿的命运和幸福，但当这钱达到一定的数量时，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改变，货币凭借其数量吸引了庄木三的关注。爱姑的反抗仰仗父亲的力量，一旦这一力量消失，她也便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在金钱和权势的共同作用下，在依附中生存的爱姑的反抗也只能是虚弱无力的。

而在《伤逝》中，作为新女性的子君在经济上的依附处境则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性命运。子君能够勇敢地冲出家庭去追求自由的爱情，却迫于生存的压力而以失败告终，思想的突围最终失败于金钱的魔爪。如西尔维娅·波特所说“金钱从来不只是硬币或纸币。它不间断地变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享受物品，金钱可以成为优美的生活、在逆境中的依靠、带来教育或日后的安全。它也可以是悲痛根源。”^[10]子君与涓生的情感发展自始至终笼罩着金钱的阴影。由于子君没有经济上的独立，需要依靠涓生来养活，小家庭的经济重担全部压在涓生一人身上。热恋时，因不需考虑经济问题，二人还可以维持一种感情上的平等；而同居后，当子君需要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涓生时，这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就不再平等了。事实上，同居后经济问题逐渐取代了感情和思想的交流而成为两人生活中的首要问题。涓生失业后，子君完全成了他的一个经济负担。涓生还可凭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处于依附地位的子君则没有更好的选择，除了重回父母的家。子君离开涓生后，还将仅有的几十枚铜元留了下来，希望涓生维持较久的生活。子君关注的始终是情感，从未意识到缺乏金钱保障的情感是多么的脆弱。金钱不能买来爱情，但如果缺少维持生存必需的金钱，爱情也会逐渐消失。所以，对作为新女性的子君来说，保证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前提仍然是经济上的独立。

鲁迅始终认为经济权是女性解放的坚实基础和保障。金钱的缺乏导致了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处境，最终导致了女性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观念，这种观

念使女性无法认识到金钱作为女性个体自由和独立的工具和保障的重要性，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利用金钱。鲁迅认为这种处境与观念的恶性循环形成了女性无法摆脱的生存怪圈。

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刻性在于他从不回避金钱作为生存手段在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肯定了超越性的理想追求，但没有因此而否定人的现实性物质欲望。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物质利益在鲁迅这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鲁迅对金钱始终保持着一份客观而清醒的智性审视，既没有将所有的罪恶都归于金钱，也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这种现代意义的金钱观，既赋予了鲁迅的小说创作以智性思维的深度，也是其能够在世俗生活中保持韧性战斗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德]西美尔. 货币哲学[M]. 陈戎女,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3.
- [2] 鲁迅. 一件小事[C]//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59.
- [3] 鲁迅. 药[C]//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45.
- [4] [德]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上海: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392.
- [5] 鲁迅. 忽然想到(六)[C]//鲁迅全集(第三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5.
- [6] 鲁迅. 孔乙己[C]//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任湘云. 金钱的魔影与否定的力量——重审〈孔乙己〉的世界[J]. 江淮论坛, 2007, (3): 135.
- [8] 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C]//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60-161.
- [9] 鲁迅. 离婚[C]//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49.
- [10] [英]艾德里安·弗恩海姆, 迈克尔·阿盖尔. 金钱心理学[M]. 李丙太,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2.

Lu Xun's Observation of "God in the human world"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s relating to money in the fictions by Lu Xun

ZHOU Lin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activ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that take money as key discours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novels of "Nahan" and "Panghua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fiction text by Lu Xun is the earliest to construct the money discourses with a lot of modernity contains, and points at realism brightly, and puts up powerful humanistic force and practical force. Lu Xun had worry and indignation about the tendency that the relations among human are influenced by money much more than before. At the same time, Lu Xun thought that money was the ensurance of the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freedom in modern times, so the ideal which is divorced from economic base is a dream. The attention and pondering over the pervasion and influence from economic structure to human spirit structure manifest the depth of Lu Xun in wisdom thinking method.

Key words: Lu Xun; money discourse; human nature; individual exist; female; wisdom examination

[编辑: 苏慧]